

允晨叢刊 110

#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

王明珂



眺望新城鎮建設的蒙古英雄祖先

照片中為巴爾虎博物館前的成吉思汗像，騎在馬上的成吉思汗，似在望著草原上城鎮建設中的新巴爾虎右旗。



歷史語言研究所凌純聲為少數民族婦女作體質測量

此照片中正襟危坐的婦女，凌之西式尺權與手杖，以及身體測量等等，顯示近代國族主義下男性與女性、科學與傳統、國族核心與邊緣等種種階序區分，也顯示西方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民族識別分類中所扮角色。

## 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 根基歷史的文本與情境

王明珂

## 目 錄

|                     |     |
|---------------------|-----|
| 序言與謝詞               | 5   |
| 前 言 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       | 13  |
| 第一章 歷史心性：邊緣與異例      | 35  |
| 第二章 英雄祖先歷史與華夏意識初萌   | 51  |
| 第三章 《史記》文本與華夏帝國情境   | 75  |
| 第四章 蜀之華夏化與方志文類      | 87  |
| 第五章 英雄徙邊記：邊疆史的模式化情節 | 111 |
| 第六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朝鮮與東吳   | 133 |
| 第七章 反思英雄徙邊記：滇與西羌    | 163 |
| 第八章 北疆與南疆的英雄祖先記憶    | 203 |
| 第九章 華夏社會邊緣的英雄祖先記憶   | 241 |
| 第十章 近代中國炎黃論述        | 255 |
| 第十一章 多重邊緣交會：索土司的祖源  | 281 |
| 結 語 歷史中的表徵與本相       | 307 |
| 參考書目                | 329 |
| 索引                  | 347 |

## 序言與謝詞

這本書的內容是我，一個自稱「炎黃子孫」的漢系中國人，對於「炎黃子孫」及相關英雄歷史之反思性研究，以及對於「弟兄民族」此一稱謂的新理解。這樣的研究，其目的並非在知識上「解構」炎黃子孫歷史及中華民族。相反的，我希望透過新的歷史知識，一種基於反思性（reflexivity）及有反省力的歷史新知，使得中國的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對自身，以及對於他族、他國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這樣的歷史新知，更能夠促進「炎黃子孫」及其「弟兄民族」間的和諧與凝聚。

人們常強調歷史上的英雄祖先；五千年前的炎帝與黃帝，約四百年前來台的鄭成功及其隨從軍民，以及在美國，三百多年前乘五月花號來到新英格蘭的英雄祖先們。人們也爭論這些英雄歷史，譬如成吉思汗、箕子及亞伯拉罕，究竟是那一「民族」的英雄祖先，他們所建立的「國」地理空間包括那些地方。強調這些「英雄祖先歷史」，常使得一些人群落入社會邊緣——因為他們不是英雄祖先（征服者）的後代，或竟為被征服者的後裔。堅持與爭議這些「英雄祖先歷史」，以及此「歷史」所支持的資源範疇與邊界，也經常造成族群、民族或國家之間的衝突。無論如何，這些被強調、爭議的「歷史」都起始於一些「英雄祖先」。然而另有一些起始於「弟兄祖先」的「歷史」，被人們忽略、埋沒。因為相對於服膺「英雄祖先歷史」之人群而言，主張這些「歷史」的族群多半是居於邊緣的弱勢群體，因而在「英

雄」成為「歷史」敘事中的主角後，他們所宣稱的「歷史」被認為是傳說、神話。

當代歷史學者，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歷史學者，常批評單一、典範與線性的歷史，強調歷史有多元的聲音。然而這樣多元、多線的歷史，經常仍是對「過去」的選擇性建構，或為對「過去」的單聲雜運爭鳴，而未見及「歷史」與人類社會間巧妙的內在聯繫。更有甚者，批評單一的線性歷史，解構某種體制與認同下的典範歷史，如此，學者——在對自身的文化與學科偏見與相關優勢權力毫無自覺的情況下——所提出的「解構性知識」常為對他者的侵犯與侮辱。無論如何，在各種權力主體以「歷史」相互解構中，邊緣的「歷史」仍然靜默。因為關鍵不在於誰的「歷史」更正確、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歷史」仍是「歷史」，「神話傳說」仍為「神話傳說」，我們便不可能認識自身與他者的「歷史」，也不可能認識為「歷史」所營造的社會情境。

在《羌在漢藏之間》一書中，我曾說明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為一種「歷史」，一種在特定社會情境下的「歷史心性」所產生之「歷史」；這是「將陌生的化為熟悉」。基於此，在這一本書中我重新認識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獻中各種「英雄祖先歷史」；我們原來所熟悉的歷史知識，在此新知下可能反變得陌生。因而這本書的工作可說是「將熟悉的化為陌生」。希望讀者與我一同由了解當今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出發，由此我們重新思考三千餘年來曾流傳於中國及其周邊的許多「弟兄祖先故事」，包括《國語》中「炎帝、黃帝為兩弟兄」之說。我們可以嘗試了解所述這些「歷史」的人群之生活情境，以及嘗試了解訴說此「歷史」人們所表達的期望與情感。但更重

要的是，我們也一同再思考我們所熟悉的「英雄祖先歷史」，特別是「黃帝後裔」或「炎黃子孫」之歷史。將它們視為另一種「歷史心性」的產物，嘗試了解人們在何種情境中書寫與訴說這些「歷史」，以及人們宣稱此種「歷史」時所流露的情感與意圖。如此，在同一認知平面上思考「歷史」與「神話傳說」，我們才能對黃帝、太伯、箕子、檀君、九隆等英雄祖先之「歷史」有反思性的認知，也能對許多「神話傳說」——特別是「弟兄祖先故事」——有真正的體會與了解。

相信如此的「反思性知識」(reflexive knowledge)，<sup>(1)</sup>可以讓宣稱自身為黃帝、炎帝、成吉思汗、箕子、太伯、三苗或蚩尤等「英雄祖先」後裔的族群，能認識自身此種歷史記憶的深層意義及其歷史過程，以及我們的先人在宣稱或接受這些「英雄祖先歷史」時的驕傲、期望，或卑曲與無奈。我們更應認識，「弟兄祖先故事」事實上可能是一種更古老、更普遍的「歷史」〈但顯然不若男性中心主義古老〉，曾廣泛流行於華夏之域及其鄰近各民族地區，以及世界其它各地。古代華夏曾稱「炎帝與黃帝為弟兄」，彝族說最早「彝、漢、藏為三弟兄」，藏族有各族群起源於「六弟兄」之說，都是此種「歷史」。我們也能由此體認，「弟兄民族」並非只是當代強調民族團結的口號，它是一種古老歷史心性與記憶的遺存。在這些對彼此之「歷

(1) 關於反思性知識 (reflexive knowledge) 與解構式知識 (deconstructive knowledge)，我引自 Kamala Visweswaran 所稱的 reflexive ethnography 與 deconstructive ethnography 之區分。我也同意其見解：反思與解構不同的是，「解構」破壞被觀察、描述者的主體性，而「反思」則保全、維護其主體性。見，Kamala Visweswaran,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史」(與歷史)的反思性體認、體會與體諒中,我們應更珍惜、反省並有思調整改進民族或國族內外的族群關係。

中國人常以「豐富的歷史文獻」而自豪。我認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漢文字書寫的「歷史文獻」,而更應是在各地人群長期交流、交鋒下產生的、以各種媒介表述的「歷史記憶」,包括被視為「民族神話傳說」的那些記憶。突破自身各種文化、學術與社會認同「框架」(邊緣),發掘我們文化與社會生活中深藏的各種知識建構範式(如 Pierre Boudieu 所稱的 *unthought categories of thought*)。(2)我們或能了解這些豐富、多元記憶的內在含意,及其形成與變遷的社會情境。如此具反思與反省的「歷史」新知,不但有助於中國各民族對彼此之了解與民族內外族群關係之改進,也將是中國歷史記憶對世界的貢獻。

這本書的重要主題與部分內容,曾在多個學術場合發表。我將「弟兄祖先故事」視為一種「歷史」,以及藉此提出的「根基歷史」概念,最早發表於黃應貴主編的一本論文集《時間、歷史與記憶》中。(3)對「歷史心性」較初期的見解,出於二〇〇〇年底我在四川大學的一場演講,後來演講內容曾改寫發表於《歷史研究》中。(4)以羌族之「弟兄祖先故事」為基礎,對「歷史心性」更完整的論述見於二〇〇三年之拙著《羌在漢藏之間》。有關「黃帝後裔」歷史記憶在

中國的發展,曾在二〇〇二年以論文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將箕子、太伯等歷史記憶視為一種「英雄從邊記」模式化情節之產物,最早的構想發表於二〇〇四年在韓國漢陽大學舉行的「Border or Frontiers」國際研討會中。「英雄祖先歷史心性」產生的英雄歷史記憶在華夏邊緣所造成的歷史心性與記憶變化,也發表於二〇〇四年「第一屆北京論壇國際會議」之會議論文中。將「歷史心性」、「文類」與「模式化情節」視為三種歷史敘事文化中的「結構」,類似觀點曾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歷史人類學集刊》的兩篇論文中。(6)對於「歷史心性」與「文類」較理論性的探討,也曾於二〇〇五年在陝西師範大學「馬長壽先生紀念講座」上發表。此外二〇〇四年我曾在以下這些大學與研究機構,發表與此著作相關的演講:武漢大學歷史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廈門大學人類學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以及台灣的師範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記憶與認同工作坊」、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等等。在以上這些會議、期刊與演講的發表中,我都獲得許多學者聽眾、評論人、審查人的建議與批評;在此我感謝他們給我的幫助與指教。我也要感謝二〇〇四下半年,我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授「反思史學:文本分析」的學生們;我許多

(2) Pierre Bou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40.

(3) 黃應貴主編,《根基歷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時間、歷史與記憶》,頁283-34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4)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5(2001):136-147。

(5) 王明珂,〈論零附:近代漢晉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2002):583-624。

(6) 王明珂,《瓦子土司的祖源:一個對歷史、神話與鄉野傳說的連環研究》,《歷史人類學刊》2.1(2004):51-88;王明珂,〈「窮人考古發現」的歷史知識考古:兼論歷史敘事中的結構與符號〉,《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4(2005):569-624。

關於反思史學的概念，都在準備此課及課堂上與學生們的討論中獲得釐清。

二〇〇五年承哈佛大學東亞語文系及哈佛燕京學社協助，我得以在哈佛大學作訪問，並完成此書；我要感謝哈佛大學 Peter Bol 教授及杜維明教授的幫忙。也在此期間，我得以在紐約州 Cornell University 人類學系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Colloquium Series，以及在芝加哥的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之人文中心（Alice Berline Kaplan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及藝術史系（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發表與此書相關的演講，得到許多人類學者與歷史學者——包括討論人 Prasenjit Duara 教授——的回應意見。我也在此感謝邀請我前往並與我討論相關議題的 Magnus Fiskesjö 及 Sarah E. Fraser 教授，以及 Duara 教授。

與本書相關的田野與文獻研究，曾得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主題計劃（2001-200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國近代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以炎黃記憶為例」（2002-2003），以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英雄祖先與國族歷史」研究計劃（2002-2004）之支持才得以完成。我對以上機構，以及在這些計劃中的合作學者，致上誠摯的感謝。特別是對於王士元院士，他對於中國民族起源的宏觀見解，對我完成此書很有啟發。而他囑我共同將「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主題計劃成果集結成書之事，我卻一直無法完成；在此我也要向王院士致歉。

在最近四年裡，與本書有關的研究曾以英文發表在各項會議上。我的朋友 Robert W. Cribbs 不僅替我訂正這些英文寫作，也常質疑並與我爭辯這些論文的內容。由於這些研究涉及「反思性」（reflexivity），一位全然不懂中文、不熟悉人類學或歷史學的質疑

者，對我常有意想不到的啟發——此也證明我們常沉浸於自己所熟悉的語言、文化與學術符號體系中而不自覺，此無自覺也如 Pierre Bourdieu 所稱的 collective scientific unconscious。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于清沼，在我奔波於田野與其他學術活動，或有時經歷困頓與挫折之時，她是我最有力的支持者。

## 前言

# 中國民族起源與形成

在中國近代學術中，「中國民族起源」是一項很受重視的課題。由歷史與神話研究中的「古華夏部族起源」，到考古學上的「中國文明起源」，到民族學與人類學者所稱的「中國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至於結合古人類學與生物遺傳等多項學科的「中國人的起源」等等之研究，皆與此問題相關。在後現代思潮影響下，對此論題學者們又有另一種思考：這種學術探求與因此建構的「歷史」，是否為在某種群體認同下人們的集體想像？如此使得這問題更複雜；不只涉及「過去發生的事實」，也涉及「人們對過去的想像與建構」。

過去十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在於「華夏邊緣」的歷史與人類學探索。一九九七年，我發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由人類生態、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等面向，探討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同時在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三之間，我多次利用寒暑期，在川西地區進行羌族田野研究。從文獻與田野兩方面研究當今與古代羌族，二〇〇三年我完成《羌在漢藏之間》一書。在這本著作中，我以一個古老的華夏邊緣——羌族——來說明華夏的成長歷程，以及推動此成長歷程的社會與文化微觀過程。這可以說是，以更具體、系統化的研究，來說明華夏及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歷史變遷。在這些研究進行過程中，我的研究旨趣愈來愈清晰：從一個新角度來看此問題，「中國民族的起源」不完全始於一個古老的「過去」、一個「核

心」，而更重要的「起源」發生在「華夏邊緣」人群間的一些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變化。

這樣的認知，部分因於我在中央研究院參與主持一項「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研究計劃。這個主題計劃由語言學（王士元院士主持）、生物遺傳學（李文雄院士主持）、歷史學與人類學（王明珂主持）等分支計劃所構成。雖然，這個研究計劃由於研究人力不足，以及三個主要分支學科間的交集不足，只進行了兩年（2001-2002）。然而我因此得以跳脫一些細微、枝節的研究，而對「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此問題作較全面的、更具深度的思考。

另外在羌族研究中，我體認到當地普遍流傳的「弟兄祖先故事」，是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一種本土歷史建構模式。如此體認，讓我反思我們所熟悉的歷史，事實上是另一種歷史建構模式——英雄祖先歷史——之產物。因而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我主持了一項「英雄祖先與國族歷史」研究計劃。在此計劃中，我與寶力格教授（Uradsyn E. Bulag）以及其他幾位學者，共同研究古今流傳於中國及其鄰近地區的各種「英雄祖先歷史」（或「弟兄祖先歷史」），探討它們所流露的各地人群之「我族」認同情感與情境。在最近四年內，我在這兩項研究計劃下寫了幾篇相關論文，或已發表，或未發表；這本書便是在這些基礎上所作的進一步補充與闡發。因此，本書可以算是「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過程」主題計劃，與「英雄祖先與國族歷史」研究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書的目的之一，是對「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作一新詮釋。因此，首先，我對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起源」研究作一簡單回顧，說明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積，以及研究觀點的轉變趨勢。

## 中原核心、多元一體、想像社群

清末以來，學者們對於「中國民族起源」問題曾有熱烈探討。雖然參與討論者中不乏當世鉅儒，然而在今之學者看來，其學術性並不顯著。他們的論述，常集中在「黃帝」或「炎黃」身上；以此華夏血緣的「起源」，為「炎黃子孫」之中國國族立本。他們論述中的華夏始祖為黃帝，或炎帝與黃帝，並爭論「黃帝」究竟來自於黃河流域、北方草原，或來自於西亞。他們也爭論，在歷史上那些民族及其後裔為「黃帝子孫」，以及孰為黃帝嫡傳、孰為黃帝庶子之後。<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學界有「黃帝為自西亞東遷的巴比倫某部族長」之說。這是「中國民族西來說」的一種論述；當時不僅流行於國外學界，就是在中國也有許多一流學者附和此說。<sup>(2)</sup>

無論如何，以黃帝或炎黃為起始的「中國民族起源」歷史，難以說明為何此國族中包括滿、蒙、藏、回等民族。後來，在比較具學術性的歷史研究中，學者們對此問題作了補充。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學者們，不強調黃帝、炎帝等「華夏始祖」的個人血緣傳承，而將他們視為一個個「民族集團」的代表性領袖人物。如在新的史學與民族學概念下，黃帝經常被認為是一個來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領；炎帝則被認為是同一民族集團中，曾與黃帝爭勝的另一支族首領，或被認為是另一民族集團之部落長。民族學的圖騰說也被用來支持這些

<sup>(1)</sup> 沈怡儒，〈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77。

<sup>(2)</sup> 蔣由智，《中國人種考》（上海：華通書局，1929）。

「歷史事實」，如黃帝等被認為是「龍」圖騰的部族，相對於東方的「鳳鳥」為圖騰的太皞部族。<sup>(1)</sup>無論是傅斯年所主張的「夷夏東原說」，蒙文通的中國「上古民族三系說」，徐炳昶所主張的中國「古代部族三集團」，或孫作雲所稱「蛇、鳥、豬、龜四部族」之說，皆以各民族集團的戰爭與融合說明中國民族（包括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之形成過程，同時也說明在此國族中孰為戰勝者後裔、孰為戰敗者之後裔。這個民族融合所發生的核心地區，也就是各民族集團爭奪之地，被認為是在黃河流域的中原。三苗、蚩尤、共工、伏羲等部族首領及其民族集團，在此歷史中因失敗而遷居邊陲，其子孫散處蠻荒深山叢林之間。因此，雖然在此「歷史」裡中國民族有多元之起源，但中原之人（或漢族）仍居其核心。至於溯及西亞的「中國民族西來說」，在此時期逐漸為學者所棄。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上古諸帝王研究中有一股「逆流」，那便是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史學。顧氏提出古帝王「層累造成說」，以此與相信這些古帝王歷史的學者相辯駁。如今我們對顧氏之「古史層累造成說」可以有新的評價。與之同時或略晚，西方實驗心理學學者巴特雷特（F. C. Bartlett）與社會學者哈夫瓦斯（M. Halbwachs）曾提出有關人類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之開創性新說；<sup>(2)</sup>顧氏

之見，已有社會記憶學說的雛形，只是未有系統化的理論而已。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國族建構的時代背景下，「疑古派」學者對中國古史人物、事跡的質疑，以及他們與維護古史者之間的激辯，顯示正、反雙方皆對「真實的民族起源歷史」有深切的渴求；只是在新的學術知識理性下，傳統文獻中的古史系統或被學者認為難以接受，或被認為需要新的詮釋而已。

無論如何，後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創立，及主其事者傅斯年先生等人所領導的「科學」史學研究，結束此爭議，並使「古史辨派」成為中國近代史學之邊緣異端。其中，李濟所主持的安陽殷墟考古及其成果，使得在中國之「起源」問題上，考古學從此得到主流地位。考古學之「實物證據」以及「科學方法」，可以說是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人之學術理想。此後，歷史學家對於黃帝、神農、堯、舜逐漸失去信心。考古學家的新議題則為，中國人類與人種起源、文化起源與文明起源等等。然而中國之「起源」空間，學者們所強調的仍在黃河流域。如在中國古人類起源上，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早受到廣泛矚目的是距今約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在中國近代人種起源上，以河北房山周口店距今兩萬年前的山頂洞人為代表。在中國文化起源方面，二十世紀上半葉廣為人知的是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前者大約分布在黃河流域中部與西部，後者約在黃河流域東部。在中國文明起源方面，李濟在其《中國文明的開始》一書中所強調的「文明之始」，則是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的「殷商文明」。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以考古學探索中國人種、文化、民族與文明起源得到更廣大重視。在此一時期（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考古學有關「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起源探索有三個

<sup>(1)</sup> 顧頡剛，《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944；北京：科學出版社，1962）；蒙文通，《古史甄微》（1933；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孫作雲，《中國古代鳥氏族諸考索》，《中國學報》3.3（1945）；黃石林、石興邦，《龍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94-102。

<sup>(2)</sup> F. C. Bartlett,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 & trans.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主要論述傾向：「本土性」、「古老性」與「多元性」。此三方面都有相當成就。以中國的人類起源來說，一九六四年發現陝西藍田人，一九六五年發現雲南元謀人，一九七五年發現湖北郧縣猿人；這些都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猿人類。至於較近的中國人種起源，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發現的有陝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廣東馬壩人、湖北長陽人、四川資陽人、巫山人、廣西柳江人；他們被認為分別代表舊石器時代中期與晚期的中國古人類（直立人與真人）。這些發現，在中國人類與人種起源此一問題上，強化了本土起源論者的信心，並且說明這本土起源應是多元並生的。

以文明起源來說，新中國的考古發現也支持中國文明的本土多元起源論。一九五〇年代發現的西安半坡遺址，屬於甘肅仰韶文化，代表黃河上游的中國文化起源。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其具地方特色的木結構房屋與水稻種植，被認為是中國文化起源的東南方代表。良渚文化過去被認為是龍山文化向南傳播的一個變種；後來，學者認為「實則這裡是中國早期文化發展的另一種中心，有它自己獨立發展的過程」。<sup>(5)</sup>早期都城興建、青銅鑄造業、複雜的宗教行為，以及社會階序化與國家形成等，被認為是文明起源的指標。因而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考古學的一些驚人考古新發現，如遼寧紅山文化中的祭台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具地方風格之青銅器，江浙良渚文化中的大量精緻玉器，都使得這些考古文化被視為中國文明「多元起源論」的證據。

學者不只是藉考古發掘來呈現這多元的中國文明起源面貌，更嘗

試建立各地域性文化相互關聯、發展而形成夏、商、周三代國家及其文化之歷程。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說」，與張光直先生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都是此一嘗試。蘇秉琦之說，是以器物類型學為主體，將各地新石器晚期文化分別納入幾個不同層次的分類體系之中，由此建立一有如語言學與動物學分類的考古文化分類體系。<sup>(6)</sup>張光直的「多中心互動說」，則嘗試說明新石器時代晚期分布在中國的多元地域考古文化，如何在龍山文化時期互動、融鑄出一些文化共性；這些文化共性，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礎。<sup>(7)</sup>這些考古學上的研究與討論雖大多未言及「民族」，然而在以「文化」對等於「民族」的觀念下，各地域文化「起源」如何凝結或被納入商、周王朝及秦漢帝國的過程，也被認為是中國民族博成重要的一章了。

二十世紀末中國學術界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接續進行的「中國文明探源工程」，表現學者對「中國文明與民族起源」此問題深入探索的宏圖，以及對科學、客觀、跨學科合作以釐清此問題的信心。這些大型研究計劃或已完成，或正在進行之中，其成果及意義已受到學界相當的矚目與討論。然而由於其尚未完成，對此我無法深入討論。無論如何，此學術宏圖應對逐漸「零碎化」的考古與相關古史研究有補闕之效。

近二十年來，民族學與人類學者也參與此問題探討。面對「多元」的考古文化與當代中國多民族構成之現實，他們不只是從「起源」，也從「過程」說明當今中華民族之「多元一體」。最早較具體

<sup>(5)</sup>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sup>(7)</sup>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four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p>(5)</sup>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7。

提出「多元一體」之說的，便是中國人類學泰斗費孝通先生。後來投身於此討論的，也以中國民族學與人類學者為主。此類研究揉合考古上的「多元文化」及其「類型」關係，歷史學者之漢人移民史與漢化之研究，以及近代民族學與人類學之調查。其中較有新意的是，如費孝通先生已注意到，由具「文化共性」的民族轉變為具「主觀認同」的民族，有一歷史發展過程。<sup>(8)</sup>

無論如何，近代以來中國歷史、考古與民族學者強調的都是一個延續性的歷史：一個或多個「起源」，延續、分化、揉合而成為當今血緣與文化上的中國人，或中華民族。<sup>(9)</sup>然而在西方「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解構(deconstruction)學風影響下，對於當代之民族與文化「傳統」，許多後現代學者所強調的卻是「歷史」與「文化」的斷裂、創造與想像。學者們認為，當代被認為是相當老的國族，事實上只是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集體建構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一些被認為是「古老的」傳統文化，也被視為近代國族認同下的文化「傳統建構」(invented tradition)。<sup>(10)</sup>依循「想像的社群」與「建構的傳統」之論述模式，近年來有些歷史與人類學者也以此理解當代「中華民族」或「中國少數民族」，以及相

關「歷史」或「民族史」的近代建構。<sup>(11)</sup>學者認為，在近代國族主義與相關學術知識(歷史學、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的導引下，世界各地都曾發生一個「國族化」(及連帶的現代化)過程。我們當前的國族認同，以及國族下的民族區分，及相關的語言、體質、民族與歷史知識，都在此過程中被建構起來。重溯此建構過程，可說是在一種「後現代」(post-modern)之知識醒覺下，對「近現代性」(modernity)之新認知，自然也是對國族與相關知識(主要是歷史與民族知識)的解構。此可被稱為一種國族「近代建構論」。然而「近代建構論者」只是解構近代以來被建構的「歷史」與「國族」，他們或完全對「古代」毫無興趣，或將「近代以前歷史」簡化為一同質、停滯的「過去」。如此一個同質的「古代」突顯了「近代」的變遷；如此也等於將「中國民族起源」視為近代史之一頁了。

## 本書主旨與研究方法

在這一本書中，我將「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此一主題，置於華夏及其邊緣的歷史框架中來探討——由「華夏」之形成及「華夏邊緣」變遷的歷史，來說明歷史上「中國」之內涵變化。這樣的「中國民族史」，完全不同于以上所述的中原核心、多元一體、想像社群等說。這是我長期從事之「華夏邊緣」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拙著《華夏

<sup>(8)</sup>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sup>(9)</sup> 一種新的「文化主義」，是以「考古學文化」追溯中國文化與民族的源頭；在此研究取向，許多中國考古學者認為華北的某些新石器文化，為黃帝族或其時代的考古文化遺存。見楊亞長，《炎帝、黃帝傳說的初步分析與考古學觀察》，《黃帝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85-93。

<sup>(10)</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11)</sup>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ed. by Stevan Harrell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orma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邊緣》及《羌在漢藏之間》兩書之論述的延續與進一步拓展。<sup>(12)</sup>對此，我作一些說明。

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我提出「華夏」由歷史記憶來凝聚，也由歷史記憶的重整來調整「華夏邊緣」。因此該書的重點，首先在於「華夏邊緣」的形成與變遷，而未多著墨於「華夏」如何藉一個共同祖源來凝聚。其次，該書只注意政治地理的華夏邊緣；其寓意似乎，無論是戰國或漢晉時期，在華夏政治地理邊緣內的人群都是「華夏」。近年來，由於羌族田野研究中的體驗，我在「族群」研究中強調對性別、階級、地域等親近人群社會區分之探究。又由於從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到更深入、具體的敘事或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使我注意「血緣」、「空間」等符號在歷史敘事中的意義。因此，我們若將華夏視為以「黃帝子孫」此共同祖源記憶來凝聚的族體，那麼，古代華夏統治者似乎皆得由「黃帝後裔」此一「血緣」而成為華夏，然而被統治者則不一定能在「血緣」上與「黃帝」相繫而進入此「族群」。此顯示「華夏邊緣」的成長、擴張，並不只是在政治地理邊緣，也發生在華夏「社會邊緣」上——愈來愈多華夏之域的社會中、下層人群，由於獲得一些「歷史」（家族史）而成為「黃帝子孫」。

我在羌族田野研究所得，以及基於此而完成的《羌在漢藏之間》一書，給了目前這本書之內容最主要的骨幹——歷史心性。在這些研究中我認識到，流行在川西岷江上游羌、藏族各溝中的「弟兄祖

先故事」，事實上是一種歷史心性下之產物。又由於認識此「歷史」與人們生存之社會情境有密切關係，使我得以對自己沉浸其間的「歷史」（以及歷史）有新的了解。我們所深信的以一英雄祖先為起始的「歷史」，事實上也是一種「歷史心性」產物。此便如法國詮釋學者理柯（Paul Ricoeur）對「歷史性」（historicity）的解釋：我們創作歷史，我們沉浸其間，我們也是這樣的歷史人。<sup>(13)</sup>

這裡所稱的「歷史」，是被人們記憶、回憶、書寫、述說、爭論的「過去」。而這樣的「歷史」，也是一種「表徵」。我們生活在一表徵化的世界中；各種權力關係與社會現實造成此表徵世界，我們也在文化所界定的語言、詞彙、符號中認識此世界。此便如在電影「駭客任務」（Matrix）中，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由電腦所創造與控制的虛擬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許多當代學者都嚴肅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突破自身所存在之表徵體系限制，而了解另一遙遠時代、遙遠地域人群的表徵世界？

雖然各學科、各別學者，對此都有不同的研究取徑，但似乎有一個關鍵方向被許多學者提及，那便是「邊緣與邊界」。社會學者埃利厄斯（Norbert Elias）所稱的「轉折時代」（a time of transition），<sup>(14)</sup>人類學者透納（Victor Turner）所強調的「界域」（liminal），<sup>(15)</sup>以及

<sup>(12)</sup> 其原文為 "(Historicity) signifies the fundamental and radical fact that we make history, that we are immersed in history, that we are historical beings." 見 Paul Ricoeur, "The Narrative Func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4.

<sup>(14)</sup>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sup>(15)</sup> Victor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sup>(12)</sup>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許多後現代主義學者所強調的邊緣 (border)、斷裂 (discrepancy)、異例 (anomaly) 等等，<sup>(16)</sup> 都是在強調此一研究關鍵。這是因為，遠離我們所熟悉的世界，遠離一切我們理性中的秩序與邏輯，再思考我們所熟悉的「詞彙」及其意含，我們較易由其中得知各種文化符碼與社會之關係，以及社會如何複製、改變、創新符碼，以維持、延續各種「邊界」（如國家、族群、職業之範疇界線）所範定的社會現實，或造成社會現實的變遷。「歷史」，也是我在所稱的「文化符碼」之一。我在羌族研究中所作的，也便是對社會與文化符碼關係的「解碼」工作。

然而以上所言，只是這樣的知識探索的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則是，將我們的思慮引回自己所存在、所熟悉的世界（另一種文化符碼體系）之中，反思我們的文化符碼與社會現實本相之關係，及其產生與被複製、改變、創新之歷史演變過程。前半部的工作是「將陌生的化為熟悉」；對我而言，也就是前十年我在羌族田野與文獻中所做的工作。後半部的工作，則是「將熟悉的化為陌生」——此即本書的宗旨。像這樣的歷史研究，也是我所理解與認知的「反思史學」（reflexive historiography）研究的一部分。

在對「歷史」的解碼工作中，如許多當代思考社會本相與文化表

1969);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Publications, 1982).

<sup>(16)</sup> 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1987); D. Emily Hicks, *Border Wri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Text* (Minneapoli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David E. Johnson and Scott Michaelsen, "Border Secrets: An Introduction," in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ed. by Scott Michaelsen and David E. John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徵的學者一樣，我的學術思慮常捲入「社會與個人」、「結構與符號」、「本相與表徵」等二元對立概念之中。希望從中尋求一條通衢大道，來解答歷史記憶如何造成社會現實本相，以及此現實本相下產生的敘事、行為、事件與物象。這些敘事、行為、事件與物象，如何影響人們的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近數十年來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多注意「文本」(text)與「情境」(context)的互映、互生關係。<sup>(17)</sup> 在特定情境下，社會權力 (power) 如何規範、導引及創作各種作為論述 (discourse) 之文本，並由此產生「知識」(knowledge)；<sup>(18)</sup> 文本或多重文本所生之論述，如何在內外情境各種權力角逐中，改變作為社會記憶之知識，以應和或造成社會情境變遷；人們在文本敘事的書寫、閱讀與理解中，如何受不同層次的敘事「結構」或「形式」(form) 所影響，以及這些敘事「結構」或形式與社會情境有何種互倚關係。<sup>(19)</sup> 在此種研究中，對口述或文字書寫文本解析的目的，並不

<sup>(17)</sup> Ravindra K. Jain ed. *Text and Context: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radi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7); Daniel Cottom, *Text and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Michael Toolan ed. *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Essays in Stylis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2); Graham Watson and Robert M. Seiler ed., *Text in Context: Contributions to Ethnomethodolog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sup>(18)</sup>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sup>(19)</sup> Paul Ricoeur, "The Narrative Functio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74-96; Terence Turner, "Ethno-Ethnohistory: Myth and History in Native South American Representations of Contact with Western Society," Commentary, in *Rethinking History and Myth: Indigenous South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ed. by Jonathan D. Hil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235-81; Daniel Cottom, *Text and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138.

在於獲得文本所陳述的「事實」或在發掘其內在「結構」，而在於將文本視為一種「表徵」，以發掘、呈現產生此文本同時受此文本塑造的「情境」。在此所謂「情境」並非「社會結構」或「文化模式」可理解，相反的，它們是在各種權力關係規劃的制度、結構與模式間，許多個人在其各自之情感與意圖下，所產生之行為、事件與「文本」所構成的整體情境。

顯然如此的研究傾向，深受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習行理論（the theory of practice），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所強調的論述（discourse）、權力（power）與「知識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之影響。這也是在致力於發掘社會結構、文化模式，並以功能與文化符號之內化象徵來強調社會與文化一體性及穩定性的研究之外，所產生的一種新學術研究趨向。此趨向轉為注意個人與群體之情感、意圖及由此產生的習行（practice）；注意被「模式」與「結構」忽略的異例、斷裂與邊緣現象，<sup>(20)</sup>以及個人跨越各種社會界定之「模式」與「結構」邊界（border crossing）的企圖與能力。也在如此之學術趨向下，產生各種與「邊界」、「邊緣」有關的研究。強調對政治與知識權威所建構的各種性別、階級、族群、國家「邊界」有新的了解；突顯混雜、多元及被忽略的邊緣個人、群體及文化現象之存在。<sup>(21)</sup>注意發生在邊緣與邊界的，或與邊緣與邊界相

<sup>(20)</sup>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sup>(21)</sup> 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1987); Mae G. Henderson ed., *Borders, Boundaries, and Frames: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關的各種事件、文本與其它現象，強調認識它們在發掘社會科學新知上的重要性。<sup>(22)</sup>在方法與認識論上，強調打破或跨越學科邊界，強調對特定學科知識生產過程的反思。<sup>(23)</sup>對傳統之「結構」研究而言，此研究傾向也開啟人類學者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稱「構組文化」（culture-as-constituted）與「實踐文化」（culture-as-lived）間的對話，以及它們如何影響或塑造人類社會之討論。<sup>(24)</sup>

我近年的研究，接近上述之「邊緣／邊界研究」，而我主要基於族群與認同理論，以及社會記憶理論而引申之「文本分析」，也深受博爾多、傅柯及理柯等學者之影響。在本書中我將說明，在文化與社會研究中的廣義「結構」，包括各種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社會本相（social reality）與習性（habitus）或心理構圖（schema）等，與行為「符號」，包括個人與群體之情感與意圖下所展現之行為、事件及相關物像，在「文本」中也有其對應的「結構」與「符號」。在本書中，我以三種歷史「敘事結構」來分析有關華夏的「歷史」<sup>(25)</sup>——它們是「歷史心性」、「文

<sup>(22)</sup> D. Emily Hicks, *Border Wri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Text*, David E. Johnson and Scott Michaelsen, "Border Secrets: An Introduction," in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1-39.

<sup>(23)</sup> Alejandro Lugo, "Reflections on Border Theory, Culture, and the Nation," chapter in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43-67; 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38-40.

<sup>(24)</sup> Marshall Sahlins,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Orde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ir Nature and Uses*, ed. by William H. Krust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35-48.

<sup>(25)</sup> 但這並不表示我同意迴歸「結構」研究。相反的，我認為只有認識這些潛藏的文本「結構」，認識各種深淺層面的「結構」及與之相應的社會本相，與其形成之歷史過程，我們才可能解讀一位作者在社會與時代情境中所生之「文本」，認識他們如何在敘

類」與「模式化敘事情節」。

一個社會情境，在其內外資源、社會制度、結構與權力關係達到某種穩定狀態時，皆傾向於複製與延續它自己；所謂「敘事結構」便扮演此種功能。它使得文本或表徵呈現一種規律性，而由此複製與延續社會本相與情境，也造成歷史本相。但這並不是說，社會「情境」與「文本」將永遠在這些敘事結構中循環不息。因為無論是「歷史心性」、「文類」與「模式化敘事情節」，都只是一些社會中流行的範式理念，它們仍賴各種「符號」構成的文本而存在。個人與群體所處的情境有差異、有變遷，所以符號之意義、象徵與敘事符號組合，以及它們在文本中產生的隱喻（metaphor），在書寫者與讀者的認知中都常有差異。如此也使得「歷史心性」、「文類」與「模式化敘事情節」不斷被文本修飾與再界定，同時也因此改變它們所對應的模式化社會情境。在本書中，這些「情境」主要便是華夏及其帝國、華夏邊緣，以及合華夏與其邊緣的近現代中國。我將說明歷史過程中各種「歷史心性」、「文類」與「模式化敘事情節」如何出現，並產生作為華夏歷史記憶的文本，這些文本如何強化華夏認同及其帝國，並造成華夏邊緣及其變遷，也因此改變華夏之空間與社會內涵。

首先在第一章，我由一個「邊緣異例」著手。在我近十年從事田野調查的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各溝羌、藏族村寨中都流行一種「弟兄祖先故事」；我分析故事中的血緣、空間與時間等敘事符號，及其與

事間，一方面有意或無意的屈從、模仿某一層面的「結構」，另一方面如何選擇、改變及組織故事「符號」，以選擇、順應或背離「結構」。最終及最重要的，仍在於理解這些文本中的屈從、模仿、選擇、創新或背離中所隱含的「人」之意圖、情感與作為，及其所應對的或受其改變的社會及歷史情境。

當地社會本相（各種認同與區分體系）之關係。以此，我認為這是一種對我們而言的異類「歷史」。由於認知「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種「歷史」，一種特定「歷史心性」下的產物，我們得以反思自己所熟悉、信賴的「歷史」，認識它們事實上只是另一種「歷史心性」下的建構。這兩種「歷史心性」，我稱前者為「弟兄祖先歷史心性」，後者為「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在本章中，我也將說明它們分別對應的社會本相。

接著在第二章中，我將說明在春秋戰國華夏認同初萌的情境中，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下，以「黃帝」為起始之「英雄祖先歷史」如何誕生；此歷史心性與相關英雄歷史，從此主宰中國兩千餘年之歷史記憶，並影響華夏之內涵與邊緣變遷。我將說明，在北方畜牧化人群（戎狄）出現之經濟生態壓力下，此時南方華夏各國知識菁英提出多種諸夏起源之說，以期將各地域部族（諸夏）凝聚為一整體。其中一個歷史建構方案為，將炎帝與黃帝當作源始的兩「弟兄」，來結合以他們為始祖的各部族。然而，最後黃帝為打敗炎帝的「英雄」，終成為主流論述。在戰國末的情勢中，形成以黃帝為結束亂世、開創文明並為諸氏族共祖的「英雄祖先記憶」。也從此在中國歷史敘事文化中，「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得其主流地位。

在第三章中，我將西漢史家司馬遷所作《史記》當作為一種文本，分析此文本如何與一「情境」——華夏與其帝國——相生相成。並說明《史記》成為正史文類之始的歷史意義。以華夏的共同血緣來說，在《史記》中不只夏、商、周王族皆為黃帝之裔，戰國時期各諸侯國貴族世家祖源也無不源於黃帝。可說《史記》之作，不但使「黃帝為華夏共祖」成為典範歷史，也確立了「英雄祖先歷史心性」在中

國歷史敘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史記》同時也描述華夏的疆域、帝國及其社會結構。《史記》篇章結構與書寫，充分反映當時漢帝國的社會現實與制度規範，因而其敘事結構不斷被後代編寫正史者依循，產生其它正史敘事，如此形成一「正史」文類。

藉此，我略介紹第二層的歷史敘事結構——文類。簡單的說，文類是一種規範化的書寫、閱讀與編輯體例；在社會文化所界定的「文類」概念下，人們得以認識相關敘事，並賦予意義。一種敘事結構之所以被複製而成為「文類」，乃因其能反映當時的社會制度、社會現實或文化傾向。「文類」的形成，也導引著這些社會制度、現實本相或文化傾向的延續發展；如「正史」文類產生之模式化文本記憶，與帝國之存在相生相成。

在英雄祖先歷史心性下，華夏不只是相信自身源於一個「英雄祖先」，也常認為華夏邊緣人群為華夏「英雄祖先」後裔，如此造成一可擴張的華夏邊緣。在華夏與其邊緣人群的交往互動中，與「族群起源」有關的社會記憶受到雙方的關懷，也成為敘述與爭論的焦點。在敘述與爭論中，「歷史」成為「神話」，或「神話」被寫成「歷史」。在第四章中，我以漢晉時期「蜀人」為例，說明華夏邊緣的蜀人，如何自華夏文字記憶中學習、選擇及改造本地「歷史」與「神話」，如此接受華夏英雄祖先，而使本地成為華夏之城，其人成為華夏之人。

蜀人常璩所作《華陽國志》，一本書寫本地歷史、地理、人物的文獻，是本章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漢晉時部分巴蜀知識菁英，已接受「黃帝」為古蜀帝王家族的祖源，《華陽國志》更確認此「歷史」。《華陽國志》透過各章節內容，處處表露作為帝國「部分」的蜀，與

帝國「整體」之關係。因其文本結構充份反映帝國「部分」之情境（郡縣），因此後來《華陽國志》之章節書寫也被模仿，而成為一種「方志」文類。「方志」文類的社會意義，在於空間上的「華夏部分、邊緣」，向「華夏整體、核心」的依附。

在漢晉時期，華夏認為許多邊緣人群都是華夏「英雄祖先」後裔。《史記》與稍晚的正史中，常出現一種模式化的歷史敘事：一個「英雄」自華夏之城遠走邊陲，而成為此地域人群的開化者與英雄祖先。我稱之為「英雄徙邊記敘事」。這也是本書中「華夏歷史」的第三層次敘事結構，一種「模式化情節」。在第五章中，我分析漢晉時華夏正史中的四個「英雄徙邊記」敘事——箕子王朝鮮、太伯奔吳、莊鱗王滇、無弋爰劍奔於西羌。華夏以此表述他們對東北之朝鮮、東南之勾吳、西南之滇國、西北羌人等四方邊緣人群的印象，也藉此刻劃其心目中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

在第六章與第七章中，我探討漢晉以來在華夏與其周邊人群之政治、社會與經濟互動下，華夏各周邊人群如何回應華夏所賦予的「英雄徙邊記」記憶。我將說明在此過程中，高句麗、高麗、朝鮮知識菁英如何逐漸排拒「箕子記憶」，以置身於華夏認同之外；東吳之人如何接受「太伯記憶」，以將自身納入華夏之中；西北方部分羌人如何成為「神佛的子民」及「大鵬鳥卵生之子裔」，也因此成為吐蕃或藏族邊緣。我也將說明，在西南的滇池、洱海地區，人們的歷史記憶如何徘徊在多重族群與文化認同之間，以及徘徊在「弟兄祖先」與「英雄祖先」兩種歷史心性之間；說明「莊鱗」如何在南詔、大理時期居於社會記憶邊緣，而在明代以來隨著中國官方及移民勢力增強，他遂成為本地方志中的重要英雄祖先。